

“数字原生代”大学生的手机使用及手机依赖研究

吴 猛 田 丰

摘要:本文使用“当代大学生就业、生活和价值观调查研究”数据,分析大学生手机使用与沟通交流、信息获取之间的关系,进而分析手机使用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从手机使用的沟通交流和信息获取需求来解释大学生手机使用的行为和心理缺乏解释力,因此,本文认为在信息社会中,作为数字原生代的大学生手机使用行为更多的是受群体文化和身份认同的影响,不宜将大学生手机依赖妖魔化,并据此对未来的研究视角、研究立场和研究内容作出相应的探讨。

关键词:数字原生代 大学生 手机

一、研究背景

根据国际电信联盟的研究,截至2013年底,全球有68亿蜂窝移动签约用户,这一数字接近地球人口的总数。同时,全球约50%的人口由3G网络覆盖,移动宽带签约用户约有20亿人,相当于全球人口的30%。特别是近年来智能手机日渐普及,手机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愈发重要,甚至很多人离开手机片刻就会引发心理焦虑和恐惧。2008年,英国邮政总局委托英国的一个研究机构(YouGov)进行了样本量为2163的调查,结果发现,超过一半的手机用户在丢失自己手机、电池耗尽、手机欠费或者没有手机信号时感到焦虑,另有9%的人感到有压力。感到焦虑的被调查者中有55%认为自己感到焦虑的原因是无法用手机与朋友或者家人保持联系。研究者把这种现象被称为“Nomophobia”,也就是“无手机焦虑症(no-mobile-phone phobia)”(维基百科,2013)。

“Nomophobia”现象的出现意味着信息时代正在彻头底改变人类社会,从20世纪90年代起,人们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多地使用信息通信技术(ICT),国际电信联盟把诞生于数字时代每天伴随着信息通信技术成长的年轻人称为“数字原生代(digital natives)”,并将这一人群界定为:“在15-24岁之间、具有五年或更多上网经验的网络化青年(networked youth)”(国际电信联盟,2013)。“数字原生代”对手机使用的依赖也引发了诸多争论,一种声音认为青年人过度地依赖手机就像药物依赖一样会引发心理或者行为障碍;另一种声音则认为青年人使用手机是信息时代的特征,不会有较多的负面作用,反而可以利用手机来提高学习效率。尽管目前尚无研究证实信息社会如何通过数字媒体来改变青年人,但青年人的学习、娱乐、社交的生活方式确实因移动通讯和网络的普及而改变。因此,针对青年人使用手机的研究对于理解“数字原生代”社会行为、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根据国际电信联盟的界定,中国的“数字原生代”涵盖了大部分的大学生人群。当代中国的大学生多出生于1990年后,他们的成长与手机和网络普及同步。在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数字原生代”不仅仅受到信息社会的影响,还不可避免地带有全球化和消费主义的烙印。而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关于中国“数字原生代”的研究相对而言还是支离破碎的,没有形成系统的研究,因此,加大对中国“数字原生代”大学生手机使用状况的研究,是对当前青年社会行为、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研究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使用全国性的调查数据,从手机使用的角度对当前“数字原生代”大学生群体进行研究,试图解答是什么原因引发手机依赖问题。

二、文献综述

随着智能手机的出现,手机逐渐融合了即时通讯、网络终端、娱乐工具等多重功能。功能的多元化对手机使用者最大的影响是手机使用逐渐从碎片化转变为长时化和固定化,手机使用成为一种固定化的生活习惯(中国互联网中心,2013)。这意味着人们在手机上花费的时间越来越多,手机依赖(mobile phone dependence)程度也越来越高,作为数字原生代的当代大学生群体也不可避免地把手机使用作为一种习惯,甚至是一种生活方式。

心理学家对手机使用习惯的研究侧重于将它看作一种心理病症或者心理障碍。国外的研究者(Bianchi & Philips, 2005; Billieux et al., 2008)参照医学和心理学对精神疾病、物质成瘾和其他成瘾行为(addiction)的研究框架,将手机依赖作为一个心理上和病理上的问题行为来研究,并发展出若干手机依赖量表,如《手机问题使用量表》(MPPUS),《手机的问题性使用问卷》(PUMPQ)等。国内的研究者也按照相似的思路,从物质依赖和行为成瘾的角度研究发展出手机依赖量表(徐华等, 2008; 屠斌斌等, 2010)。综合心理学领域对手机依赖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如何通过量表来诊断或者判断手机依赖的程度,并从不同维度,如从行为(心理)耐受性、行为(心理)戒断、社会功能和生理反应,来解构手机依赖问题。

心理学家的研究借鉴了物质成瘾的研究,不仅关注了手机依赖行为,而且关注到行为背后的生理和心理原因,其研究框架、思路和方法对后续研究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但手机依赖与物质成瘾在形成原因、行为表现和生理影响上并不相同,没有足够的研究证明手机依赖是一种病症或者问题,国际电信联盟发布报告也认为手机依赖并不能视为心理或者生理上的病症。因而使用对物质依赖和上瘾行为的研究框架来分析手机依赖行为固然有很好的借鉴意义,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研究立场上的偏倚。研究立场上的偏倚在针对青年人群和学生群体的研究中体现的尤为明显。

关于青年人群和学生群体使用手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高校范围内。随着青年人使用手机的普及,国内外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到青年人群和学生群体,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其一是什么青年人群热衷于使用手机? 其二是影响学生手机依赖的因素有哪些?

手机作为通讯工具和网络终端,从技术层面上讲本身具备了沟通和获取信息两个社会功能。除此以外,国外学者认为,青年人群和学生群体使用手机还有文化层面的功能,即群体性的身份认同(Clonen, K. 2002; Wilkinson, R. B. 2004)。在同侪群体中,使用手机交流沟通或者获取信息是“数字原生代”的共同特征,不具备相应行为方式的青年容易被边缘化或者孤立化。因此,对于是否应该控制青年学生使用手机这一问题上产生了争议。有些学者(Selwyn, 2003; Kring, B. 2012)关注到学生在课堂上大量使用手机的现象之后,讨论主要集中于如何在移动网络时代,利用手机改变教育方式和教学方法;一些研究者还讨论了使用手机教学对学习成绩的影响,并据此提出实现老师课堂教学和学生手机学习互动的新颖思路。当然这些方法是否有效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观察。国内的研究者在方法论上多使用自己编制测量手机依赖程度量表,分析手机依赖的影响因素,比如性别、性格、生源地和专业等等。这些研究并没有达成一致性的研究结论,比如手机依赖对学习的影响,或者手机依赖与学生性格的关系等,而在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上却往往沿袭传统思路,将手机依赖视为影响学生学业成绩、心理性格、日常行为“异常”的原因之一,并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提出纠正手机依赖这一“异常”行为的教育手段和方法。这与国外研究者提出的在信息社会中对学生使用手机应当因势利导,将手机作为促进教学,有助于学习工具的思路大相径庭。李止庸在综述了手机依赖的研究之后,认为国内研究较为薄弱,通常是根据粗浅调查并以总结方式得出共识性的结论,很少经过科学检验(李止庸, 2011)。

实际上,青年人群和学生群体对手机的使用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现象从其出现到现在时间不长,国内外研究者的研究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研究体系,也没有形成确信的研究结论。我们在当前研究中必须要特别注重的一个背景条件是:当前社会是一个移动互联的信息社会,现在的大学生是

“数字原生代”，他们成长经历决定了手机在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和功能，他们也习惯在日常生活中与手机形影不离。爱立信消费者研究室发布的《中国数字原生代的通信消费模式》认为中国数字原生代普遍更有自信挑战权威、更具全球视野的消费意识、且更加愿意探索新的工具进行沟通连接。这也说明“数字原生代”大学生是与之前“数字移民^①”截然不同的一代人，因而对“数字原生代”大学生手机依赖的研究必须立足于信息社会这个大的时代背景，否则就可能陷入把年轻人污名化的困境。樊佩佩认为移动电话革命可以看作基于当代社会网络基础上沟通模式转型的结果，手机技术的使用与社会变迁是双向作用关系，即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决定了对手机的依赖，而移动通讯技术的运用又促进了他们生产生活的改善(樊佩佩,2010)；杨善华和朱伟志则把手机使用视为人们“主动”选择的结果，其背后是网络文化的新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杨善华、朱伟志,2006)；有研究认为手机使用与社会资本、社会网络存在紧密的联系，手机依赖实际上是手机成为人们依赖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的工具。可见，无手机焦虑症或者手机依赖背后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因此，需要通过较为科学的抽样方案设计，和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藉以把握当前大学生使用手机的原因，以及不同原因对手机依赖的影响。

三、研究假设和数据来源

“数字原生代”的当代大学生群体，使用手机的原因和目的多种多样，这一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信息社会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使用需求的变化。从调查数据分析结果来看，大学生自己认为手机使用首先是增加了交往和沟通，其次是丰富了知识和资讯，然后才是浪费时间、耽误听课，而认为学生成绩未受到影响和耽误学习的比例几乎相当，只有很少的学生认为手机使用使得他们与家人、朋友、同学的关系疏远了。

表 1 手机使用对大学生的影响

手机对大学生的影响	百分比	排序
增加了交往和沟通	55.01	1
丰富了知识和资讯	49.79	2
浪费时间	35.58	3
耽误听课	34.97	4
学习成绩未受到影响	25.52	5
耽误学习	25.17	6
身体素质下降(如视力下降)	24.28	7
有信息安全的隐患,带来了骚扰	20.22	8
提高了生活和学习的效率	17.56	9
开销造成负担	14.02	10
跟家人朋友同学的关系不如以前亲近了	9.18	11

从数据分析的结果来看，大学生使用手机的最大影响是增加了交往和沟通，其次是丰富了知识和讯息，综合以往研究，手机依赖可能与大学生的社会网络沟通、信息需求有关。据此，本文提出两点假设：

假设一：大学生手机依赖程度与参与社会活动呈正相关关系。

大学生社会网络相对较为简单，主要集中在校园内，与大学生参与的学校组织和学生活动存在

① “数字移民”是指在信息社会或者数字时代来临之前就完成社会化的一代人。

比较强的关联,本文假设一认为大学生在学校内外社会活动参与越多,其社会网络越大,手机依赖程度就越高。

假设二:大学生手机依赖程度与网络使用强度呈正相关关系。

大学生想要获取知识和咨询越多,其使用网络越多,而智能手机能够像电脑一样上网并获取知识和咨询,那么就存在着一种可能:大学生网络行为越多,手机依赖程度就越高。据此本文提出假设二。

假设一和假设二实际上的立足点是从技术层面把手机作为社会交往和获取信息的器具来看待,同时,本文也将检验其他影响手机依赖的因素,比如性别、学校等级、上大学前的户籍性质等等。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组织实施的“当代大学生就业、生活和价值观追踪调查”。该调查采用了典型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办法。根据现行的国家教育体系的特点,选择具有典型代表性的12所高校作为调查样本点。为了确保所选高校具有典型代表性,样本点选择兼顾了高校等级(重点大学、普通大学和高职院校)、高校类型(综合类、理工类、文科类等)、高校地域分布(北上广、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华中、华东和华南)三个因素,最终选择了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四所重点大学、四所普通大学和四所高职院校。

在选定了学校之后,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办法,先在全校范围内随机抽取八个院/系/专业,然后在选定的院/系/专业中每个年级随机选择一个班级,最后在班级中随机抽取相应个学生。由此,就确保了各个学校的样本的随机性和代表性,也确保了有足够的样本数量来确保调查的可信度,从而实现比较群体内部个体与个体差异的目的。

2013年“当代大学生就业、生活和价值观追踪调查”共获得7875个有效样本,样本应答率73.9%。12所高校中应答率最高的97.0%,应答率最低的60.5%,大体上确保了样本的随机性、代表性和可信度问题。

四、主要分析结果

(一)大学生手机使用的测量

本文使用的手机依赖量表是从使用者的角度测量手机依赖的行为和心理,主要包含9个问题。

从调查结果来看,超过80%的受访学生在忘带手机时会感觉到不习惯,对不能上网感到焦虑的比例也较高,有超过60%的受访学生认为日常生活离不开手机,超过57%的学生尝试过没事的时候不看手机但很难。这些都说明手机使用与日常生活结合非常紧密,学生对手机存在较多的依赖感,在没有手机或者没法上网的时候会感觉到不习惯和焦虑。

在学习时有超过一半的受访学生不看手机,但三分之二的受访学生在上课、开会时也常常看手机,这一看似矛盾的结果说明学生把在校的学习和上课、开会区分开,有时候上课并不意味着学习,而学习也不一定就是上课。还有接近三分之二的受访学生在休息时间关掉手机或者静音,有超过55%的学生和同学、朋友在一起时不看手机,说明大部分学生对手机的使用有一定的自我控制力。

从上面的描述性分析来看,大学生对手机使用确实存在一定的依赖,同时,大学生对手机使用还存在一定的自我控制能力,在学习、休息和社交的过程中能够控制手机使用,因而可以认为大学生手机使用过程并非是单向度的依赖,还有自觉的控制手机使用的抵制,在量表实际时应该考虑到正反两个维度。

按照调查中关于手机依赖的量表设计,本文在因子分析时选择了两个特征根超过1的因子,并在旋转后标准化。从因子负荷来看,因子1的主要贡献来自于对手机依赖的题项,因此,可以说因子1是手机依赖因子,即手机依赖程度越高,因子得分越高;而因子2的主要贡献来自于对手机使用有自我控制的题项,因此,可以说是手机控制因子,即手机使用控制程度越高,因子得分越高。

表 2 手机使用行为的描述

手机使用行为	非常像	有一点像	不太像	完全不像
出门忘带手机感到很不习惯	45.87	35.20	13.97	4.96
手机无法接入互联网(只能通话或短信)感到焦虑	19.57	39.58	30.04	10.81
学习的时候我不看手机	15.86	37.07	40.77	6.30
上课、开会也常常看手机	21.52	45.97	25.88	6.63
休息时间我关掉手机或者设置静音	39.00	26.70	25.48	8.82
跟同学和朋友在一起我不看手机	16.62	39.75	38.14	5.49
尝试过没事的时候不看手机但很难	18.79	38.51	32.34	10.36
日程安排、学习娱乐等日常生活都离不开手机	24.07	36.46	29.35	10.12
用智能手机和普通手机对我来说无所谓	17.40	29.94	37.52	15.14

表 3 手机使用行为描述的因子分析

手机使用行为	因子 1 负荷	因子 2 负荷
出门忘带手机感到很不习惯	0.617	-0.011
手机无法接入互联网(只能通话或短信)感到焦虑	0.687	-0.009
学习的时候我不看手机	-0.035	0.583
上课、开会也常常看手机	0.531	-0.054
休息时间我关掉手机或者设置静音	0.122	0.451
跟同学和朋友在一起我不看手机	0.002	0.610
尝试过没事的时候不看手机但很难	0.719	0.050
日程安排、学习娱乐等日常生活都离不开手机	0.686	-0.043
用智能手机和普通手机对我来说无所谓	-0.112	0.417

同时,根据因子得分,将两个因子分别标准化为均值为 0,标准差为 1 的正态分布,并依据标准化之后的因子得分将大学生分别五等分分组。可以看到因子得分越高,手机依赖程度和手机自制程度就越高。

表 4 手机使用行为的两个因子得分分组

手机依赖度分组	均值	标准差	手机自制度分组	均值	标准差
手机依赖度很高	1.09	0.25	手机自制度很高	1.14	0.35
手机依赖度较高	0.48	0.12	手机自制度较高	0.48	0.10
手机依赖度一般	0.13	0.12	手机自制度一般	0.06	0.12
手机依赖度较低	-0.31	0.14	手机自制度较低	-0.36	0.12
手机依赖度很低	-1.39	1.19	手机自制度很低	-1.33	1.18

(二)大学生手机使用与社会参与活动

大学生使用手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互动的需要,手机作为人际沟通的工具,失去了手机意味着失去了与其他人的联系,而社会参与活动越多,与他人的联系越多,产生手机依赖的可能性越大。大学生的社会参与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学生干部、社团活动和校外兼职,本文从这三个方面来测量大学横的社会参与程度。从调查结果来看,大学生社会参与最多的是参加社团,超过 84% 的大学生曾经参加过社团,超过 30% 的大学生曾经是社团中的干部或者骨干;接近 70% 的大学生有校外兼职经历;在学生干部中比例最高的是班长和班干部,其次是学生会干部。

表 5 大学生社会活动参与状况

社会活动参与状况	百分比
学生干部经历	
研究生会干部	3.23
学生会干部	21.60
团委或团支部委员或书记	6.96
党委或党支部委员或书记	2.39
班长或班级干部	37.32
学生社团干部	15.39
其他学生组织干部	9.12
校外兼职经历	
曾经有校外兼职经历	69.88
社团参与经历	
从未加入任何社团	15.73
曾经加入过,只是一个普通成员	53.54
曾经加入过,自己是社团组织者\骨干或积极分子	30.73

本文将大学生社会参与活动视为一个累加量表,即每项学生干部经历计做1分,校外兼职经历计做1分,作为普通成员参与社团计做1分,作为骨干参与社团计做2分。累加量表的得分在0-9分之间。从社会参与活动能够累加量表的得分情况来看,只有3%的受访学生没有参加过任何社会活动,得分主要集中在1-4分之间,总体上呈现于截断正态分布。

表 6 大学生社会参与活动量表得分

社会参与活动得分	频次	百分比	社会参与活动得分	频次	百分比
0	230	3.00	5	600	7.83
1	1022	13.34	6	226	2.95
2	2110	27.53	7	60	0.78
3	2029	26.48	8	12	0.16
4	1371	17.89	9	3	0.04

按照研究假设一,产生手机依赖的重要原因是人际沟通的需要,而社会活动参与越多,人际沟通的需要也就越多,因此,手机依赖程度与社会参与活动应该呈现出正相关关系。但数据分析发现,手机依赖程度与社会参与活动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显,手机依赖度很高、较高、一般、较低和很低的大学生社会参与活动平均得分差异不大,中位数均为3。同样,手机自制度与社会参与活动的关系也不大。同时,相关分析也表明,手机依赖与社会参与之间没有显著相关关系,因此验证了假设一是错误的。

表 7 手机依赖度和手机自制度与社会活动参与的关系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手机依赖度很高	2.83	3	1.40	手机自制度很高	2.82	3	1.37
手机依赖度较高	2.83	3	1.42	手机自制度较高	2.88	3	1.43
手机依赖度一般	2.90	3	1.37	手机自制度一般	2.88	3	1.40
手机依赖度较低	2.92	3	1.41	手机自制度较低	2.84	3	1.45
手机依赖度很低	2.75	3	1.45	手机自制度很低	2.80	3	1.39

(三) 大学生手机使用与网络活动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使用手机上网不再是稀奇的事情,事实上,手机应用的出现使得无论是浏览新闻,还是网络聊天都变得更为容易,手机已经是大学生们从网络上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因此,可以假设大学生使用网络越多,手机依赖程度越高。

从调查结果来看,大学生上网的最主要目的是在网上联络他人;其次就是浏览新闻、获得资讯;再次是进行休闲娱乐;也有接近三分之二的受访学生通过网络学习知识。此外,调查还包括学生使用论坛、微博,通过网络购物等等。本文把大学生网络使用作为一个累加量表来使用,总共有七项内容,每项内容选择经常记4分,选择有时记3分,选择偶尔记2分,选择从不记1分,量表最低得分是7分,最高得分28分。

表8 大学生网络活动参与状况

类目	从不	偶尔	有时	经常
浏览新闻,了解社会动态,获得资讯	4.90	21.88	22.77	50.45
通过网络(如QQ/MSN/人人网等)保持和朋友联系或认识新的朋友	3.33	18.78	26.10	51.79
通过网络(如论坛、BBS、微博等)来发表自己对时事或社会事件的看法和评论	12.68	35.90	30.89	20.53
把网络当成一个日记本,记录自己的心情。	23.11	42.69	22.12	12.08
通过网络(如网络视频、网络音乐、网络游戏)来进行休闲娱乐	6.13	23.62	32.81	37.44
通过网络(如百科网站、专业知识网站)开展专业或业务知识的学习	4.82	30.03	39.38	25.77
借助网络来方便日常生活,如网络购物、网络订票、求职、网络炒股等。	13.22	35.90	32.80	18.07

分析结果表明,手机依赖与大学生网络使用呈现出微弱的正相关关系,网络使用越多的大学生,手机依赖程度越高,反之,网络使用越少的大学生,手机依赖程度越低。虽然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但相关性是很微弱的。以手机依赖程度作为因变量,网络使用作为因变量做回归,其标准化回归系数仅为0.138,意味着网络使用程度提高100%,而手机依赖度只提高13.8%。而手机自制度与网络使用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相关程度也是很低,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087,意味着网络使用程度提高100%,而手机依赖度只提高8.7%。综合来看,虽然假设二被证实,但较弱的相关关系对大学生群体的手机依赖而言并没有足够的解释力。

表9 手机依赖度和手机自制度与网络活动参与的关系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手机依赖度很高	20.64	21.00	4.36	手机自制度很高	19.28	20.00	4.18
手机依赖度较高	19.84	20.00	4.08	手机自制度较高	19.37	20.00	4.08
手机依赖度一般	19.80	20.00	3.57	手机自制度一般	19.68	20.00	3.51
手机依赖度较低	19.49	20.00	3.43	手机自制度较低	20.02	20.00	3.70
手机依赖度很低	18.91	19.00	3.70	手机自制度很低	20.34	21.00	3.79

(四) 手机依赖的影响因素

李昌镐(2014)通过对韩国3000名10-19岁的学生进行的网络调查发现女生比男生手机成瘾程度高,高年级比低年级学生成瘾程度高,经济水平较低的家庭青少年对智能手机更为依赖。这说明手机依赖除了沟通互动和获取信息的需求之外,还存在着其他的影响因素,故此,本文建立了手机依赖程度的OLS回归模型,以标准化之后的手机依赖因子得分为因变量,逐次加入三组自变量建立三个回归模型,以检验不同因素的影响。

在模型 1 中,放入了考大学前的户籍,年龄、性别和学校等级四个的自变量;模型 2 新增了社会活动参与程度、网络活动程度、家庭收入等级四个自变量;模型 3 新增了拥有手机类型和拥有电脑类型数量两个变量。

表 10 手机依赖的影响因素线性回归模型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考大学前为农业户籍(非农业户籍为参照组)	0.049 -0.02*	-0.014 -0.02	-0.052* -0.02
年龄	-0.009 -0.01	-0.014* -0.01	-0.01 -0.01
女性(以男性为参照组)	0.174*** -0.02	0.140*** -0.02	0.152*** -0.02
普通大学(以重点大学为参照组)	-0.134*** -0.03	-0.082** -0.03	-0.083*** -0.02
高职院校	-0.256*** -0.03	-0.157*** -0.03	-0.133*** -0.03
社会活动参与程度		-0.006 -0.01	-0.011 -0.01
网络活动程度		0.028*** 0.00	0.024*** 0.00
家庭收入等级		0.025*** 0.00	0.015*** 0.00
只有非智能手机(以既有非智能机,又有智能机为参照组)			-0.413*** -0.04
只有智能手机			-0.082** -0.03
有几种电脑			0.031 -0.02
常数项	0.015 -0.13	-0.491** -0.15	-0.351* -0.15
R ²	0.019	0.041	0.065
N	7192	6370	6367
BIC	19652.4	16554.6	16416.5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分析发现:(1)考大学前为农业户籍的大学生手机依赖程度略低,且在三个模型间的变动不稳定,说明农村生源的大学生和城市生源的大学生在手机依赖上的差异需要进一步观察研究。实际上,无论城市生源的大学生还是农村生源的大学生在同样的校园环境里很难不被其他人所感染,因而其在手机依赖上具有同质性也是可以接受的;(2)女生的手机依赖程度显著地高于男生,这一点与韩国学生情况较为相似;(3)年龄没有显著影响。由于我们调查的大学生群体年龄较为集中,没有产生显著影响也在情理之中,这一发现同时也证明了作为一个年龄相近的同侪群体,大学生微弱的年龄差异不会改变他们整体文化和身份认同;(4)与重点大学学生相比,普通大学和高职院校学生的手机依赖程度更低,其中高职院校学生的手机依赖程度最低。这可能与重点大学获取和关注信息的程度更高有关,而高职院校的学生可能不太关心新闻等信息;(5)社会活动参与程度对手机依赖没有显著影响。再次论证了假设一是不成立的,且这也说明手机具有的交流沟通功能本身是

影响手机依赖的重要原因,而不是交流沟通的强度或者频率;(6)网络活动程度越高的大学生手机依赖程度越高。由于手机也同样承担了获取网络信息的功能,因此,网络活动也有可能通过手机来实现,从而与手机依赖形成了正相关关系;(7)家庭收入等级越高的大学生手机依赖程度越高,这一点与韩国的发现相反。中国大学生生活费用和学习费用主要来自于家庭,因此,家庭收入等级越高的大学生他们生活费水平就越高,能够承受手机消费的能力就越强,能够更多的使用手机,从而出现了与手机依赖正相关的状况;(8)使用非智能手机的大学生手机依赖程度显著低于使用智能手机的大学生。这说明手机功能的增加会加大大学生的手机依赖程度,尤其是智能手机具备的网络功能对大学生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沟通和获取信息的书断;(9)拥有多种电脑,如同时拥有笔记本和平板电脑,对手机依赖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尽管智能手机一定程度上具备了电脑的功能,但电脑并不能反过来取代手机的作用,因而没有出现电脑对手机的替代效应。

此外,从模型1到模型3的分析发现,模型整体的拟合程度并不高, R^2 值较低,说明在研究中我们能够发现对手机依赖有显著影响的因素,但这些因素并不足以解释大学生群体整体上对手机的依赖,也不足以很好的解释大学生群体之间的手机依赖程度差异,也从另一面证明了手机依赖其实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现象。

五、研究结论和讨论

本文的研究从大学生使用手机的最主要两个影响因素入手分析发现:(1)大学生社会活动参与和手机依赖之间不存在明显的联系;(2)网络活动参与和手机依赖之间存在较弱的相关关系。手机使用最主要的两个影响因素是沟通联络和获取信息,鉴于大学生群体手机使用没有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以及呈现出强相关关系,这意味着我们无法从手机使用技术层面来解释大学生群体手机使用行为和习惯,或许应该更多的从代际文化的视角来解读数字原生代的手机使用行为和习惯;(3)研究发现性别、学校等级、网络活动程度、家庭收入等级、是否有智能手机对手机依赖具有显著的影响,但这些显著的影响因素并不足以解释大学生群体手机依赖的差异,这也从另一面证明了手机依赖其实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现象;上述因素的影响是微弱的,且不是决定性的,这也同样说明了“数字原生代”大学生手机使用是一种常态的行为习惯,是一种代际文化。

上述的研究结果论证了一个事实,处于信息社会的“数字原生代”大学生手机使用是一种常态,影响大学生手机依赖的因素可能很多,但大多数因素与大学生手机使用之间的关系只是弱相关关系,并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换言之,大学生所谓的手机依赖是时代大背景下,数字原生代青年特有的群体文化中产生的惯常行为,想要在时代大背景下,使用个体的差异来解释一个时代现象是不能够成立的。这意味着不能把一个时代的文化习惯和行为规则解释为社会中行动者个体差异。所谓的手机依赖不过是一个时代特征,并非是个体行为偏倚的结果。作为主导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数字移民”们或许应该站在“数字原生代”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年轻人的手机使用问题:其一,信息社会中,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和使用都与之前的社会不同,手机作为获取信息、资讯,维系或者扩大社会交往的工具,已成为了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且是青年群体的文化习得和身份认同的标志,由此而产生的无手机焦虑或者手机依赖是一个时代的特征。实际上,即便没有手机,人们为了满足信息需求或和社会交往需求,也会依赖其他类型的电子信息产品,比如科技公司研制的其他电子穿戴设备可能会让人们产生比对手机更多的依赖。因此,应从社会文化视角把青年一代对手机的使用视为正常的社会性需求,而非社会问题或者病态的社会现象;其二,数字移民与数字原生代之间的“代际数字鸿沟”使占据现在社会主流地位的数字移民难以完全理解数字原生代的生活方式、群体文化。如果研究者、教育家不能够站在“数字原生代”角度分析当前大学生乃至整个青年一代人的手机使用行为,势必会站在青年一代的对立面,这有可能演化为两代人之间代际文化的对抗,这一对抗的结果将不会对青年人的发展,进步产生任何有益的影响。因此,应站在“数字原生代”的角度理解和分析手机使用才是顺应社会潮流发展的大趋势。其三,国外学者对于大学生群体和青年一代使用

手机的行为,提出应该因势利导,把手机使用与课堂听讲、课下学习和扩展知识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手机在提高学校效率方面的潜在功能和应用。从中国当前的情况来看,大学生手机依赖已是个普遍现象,因此完全可以考虑如何通过手机使用来实现提高学习效率的目的,但这方面的研究还是凤毛麟角,因此,从研究内容来看,应该拓展如何发挥手机在提高学习效率的应用型研究,藉此达到有利于青年人学习文化,掌握知识,扩展视野的目的,实现一举多得的良好教育效果。

参考文献:

- 樊佩佩,2010,《从传播技术到生产工具的演变——一项有关中低收入群体手机使用的社会学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第1期。
- 国际电信联盟,2013,《衡量信息社会发展》,参见《国际电信联盟》(http://www.itu.int/en/ITU-D/Statistics/Documents/publications/mis2013/MIS2013-exec-sum_C.pdf)。
- 李昌镐,2014,《韩国青少年只能手机成瘾现象严重》,《中国青年研究》第2期。
- 李止庸,2011,《国内外“手机依赖对大学生学习行为的影响”研究综述》,《中国商品学会第十四届学术论坛暨中韩商品科学交流会议论文集》。
- 屠斌斌、章俊龙、姜伊素,2010,《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问卷的初步编制》,《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汉文综合版》第4期。
- 维基百科,2013,《Nomophobia》,参见《维基百科》(<http://en.wikipedia.org/wiki/Nomophobia>)。
- 徐华、吴玄娜、兰彦婷、陈英和,2008,《大学生手机依赖量表的编制》,《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第1期。
- 杨善华、朱伟志,2006,《手机:全球化背景下的“主动”选择——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手机消费的文化和心态解读》,《广东社会科学》第2期。
- 中国互联网中心,2013,《2013年中国手机网民娱乐行为研究报告》,参见《中国互联网中心》(<http://www.cnnic.cn/hlwfzj/hlwzxbg/wybg/201309/P020130924410388961354.pdf>)。
- Bianchi, A., Phillips, J. G. 2005, “Psychological Predictors of Problem Mobile Phone Use”, *Cyber Psychology & Behavior*. Vol. 8(1).
- Billieux J, Van der Linden M, Rochat L. 2008, “The Role of Impulsivity in Actual and Problematic Use of the Mobile Phone”, *Applied Cognitive Psychology*. Vol. 22(9).
- Clonen, K. 2002, “SMS Behaviour of Flemish Juveniles: Cell Phone Usage as an Instrument of Social Bonding and Peer Group Prestige”, *Ethnographica*. Vol. 2.
- Kring, B. 2012, “Generation Text Goes to College: A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the Eastern Group Psychotherapy Society*. Vol. 36(3).
- Selwyn, Neil 2003, “Schooling the Mobile Generation: The Future for Schools in the Mobile-Networked Societ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Vol. 24(2).
- Wilkinson, R. B. 2004, “The Role of Parental and Peer Attachment in the Psychological Health and Self-esteem of Students”,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Vol. 33(6).

作者单位: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吴猛)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田丰)

责任编辑:李春玲